



颠狂的蛇年之夏

李云 岳风等编著

193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颠狂的蛇年之夏

—1989·学潮·动乱·暴乱纪实

李云 岳风 晓利 南士 黎珊 编著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久平 钟 平
封面设计 许 涌

颠狂的蛇年之夏

李云 岳风 晓利 南士 黎珊 著

* * *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206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ISBN 7-81024-095-1

D·11 定价: 3.55元

前 言

1989年春夏之交，将满4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划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现实冲击与威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发动军事入侵、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到寻找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代理人，施展“和平演变”策略，无论手法怎样翻新，其根本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进入80年代后，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

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曾反复遇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袭扰；这种思潮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我国变为一个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战

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就是这种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交织作用的必然产物。

本书所记述的就是这场政治风波的前因后果、演变过程，即由学潮到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搞政治动乱，直到最后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经过。本书是纪实文学作品，不可能象理论专著那样作深层的研究，而且，笔者认为，对这场全国性的政治动乱的研究，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本两本书所能解决的，当务之急应是将事情的真相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系统地介绍给读者，以启发全国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都来反思，这是笔者成书的初衷，即便如此，由于事实本身就最有说服力，而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都在思索、探究，同时笔者在记述事情的真相和人们的思索时，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与归纳，因此本书对许多重大问题亦不失初步探究。

例如，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实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人民经过反复抉择，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的结果。要在现在的中国搞资本主义，势必危及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而且在中国现在经济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出现资本主义固有的两极分化，势必由于劳动成果被无偿占有，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命在萎缩状态下维系甚至无法生存，更何况在帝国主义有了近百年发展、国际垄断资本无孔不入的国际环境中，搞资本主义势必使中华民族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些，理所当

然要遭到人民的反对。本书记载的许多事实表明：在这场政治风波的最初阶段，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同情和支持。是因为极少数人打出的旗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惩治腐败”等，这些口号符合人民的基本政治立场，反映了人们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不满，他们也就容易骗取人们的信任。但是，极少数人想利用人们对新条件下分配不公现象的不满，来建立一个无偿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后来，随着他们的真实目的的逐渐暴露，人们很快就唾弃了他们。他们的失败表明，在中国要违背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又如，为什么青年学生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走上街头，而事态的发展却又走向他们良好愿望的反面，最终演出了一出被人利用的悲剧？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大多数青年学生本意并不是想制造动乱，他们的愿望也是希望中国尽快地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利用了学生们的这种爱国热情，开始并不亮出其反动的政治纲领和目标，而是打出冠冕堂皇的旗号，将真实目的逐渐向学生渗透，通过制造谣言，扩大事端，一次又一次刺激学生的激情，使得学生们一步步卷入动乱尚不自觉。青年学生对中国的国情、对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要求并没有全面的了解和真实的体验，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也没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凭着一股冲动幼稚的政治热情，采用的又是一种违背民主与法制的方式，结果自觉不自觉地被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牵着走、推着走，越来越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丧失了理智，全凭意气用事。尽管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给了台阶，反复真诚地劝告，但仍无济于事。他们不顾可能出现的严重的后果，非争个输赢而不罢休。直

到反革命暴乱爆发，为保卫人民共和国的卫士流血牺牲，才使部分青年学生幡然醒悟，发出“我悔！我恨！”的呐喊。

等等。

在成书过程中，我们选取的材料一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真相，二是我国报刊、电台、电视台的报道。在选材时，我们充分注意到对一个事件的各种材料的印证、核实，力求做到准确、客观。同时，我们十分注重抓住这场政治风波的主要方面、本质因素，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来指导成书，力求使本书能起到帮助人们认清这场政治动乱的真相和本质以启迪人们思维的作用。

但是，由于作者的水平与能力所限，成书的时间又十分仓促，对于这样一个前后近两个月的全国性事件，选取的材料也只能是主要的东西，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书中难免有不到之处以及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点。

作者

1989年7月27日

目 录

1	哀调的弦外音	(1)
2	新华门前的喧嚣	(11)
3	“4·20”惨案真相	(17)
4	长安街悲歌	(23)
5	西安：古都野火	(29)
6	长沙大洗劫	(34)
7	无限期罢课	(41)
8	“4·26”社论前后	(47)
9	“4·27”：政治大喘气	(54)
10	《导报》风波	(62)
11	不和谐的对话	(72)
12	“5·4”树欲静而风不止	(85)
13	余烬未熄的篝火	(91)
14	记者请愿	(99)
15	绝食！绝食！	(104)
16	历史性的会晤	(111)
17	新闻失控	(118)
18	百万群众大游行	(125)
19	生命线	(133)
20	偏执的民主	(141)
21	戒严令发出	(157)
22	拦阻军车	(166)
23	余波未平	(175)

24 赴京潮	(182)
25 “飞虎队”的生灭	(189)
26 理性的呐喊	(194)
27 女神暗影	(204)
28 临终闹剧	(211)
29 车祸导火线	(216)
30 暴行	(222)
31 天安门广场清场	(232)
32 上海：“6·6”焚车事件	(244)
33 成都大骚乱	(252)
34 瘫痪的京广线	(259)
35 谣言四起	(270)
36 法网恢恢	(280)
37 历史的发言	(289)

1 哀调的弦外音

四月的北京，春光明媚，骄阳灿烂。

与往年不同，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塞北的风沙威胁，更没有出现1988年那种风沙肆虐的“昏黄日”。

自然气候是令人心情舒畅的。但是，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的北京人，在异常的政治气候中，已经预感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可能不会在风和日丽中静静度过。

1989年，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历史把三大事件组合到一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早在88年底、89年初，北京一些高校中，就流传着“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将有大动作”的说法。

事实上，“大动作”的序曲早已开始。

如果说，从《丑陋的中国人》到《河殇》现象，只是在泛文化的大讨论中，隐含着对现实的批判，那么，去末今初的一些活动则属锋芒毕露了。

去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上，名学者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而资深学者戈扬接着说：他“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

今年1月28日，北京“都乐书屋”筹办了一个“新启蒙沙龙活动”，约100多位中国人和美国、法国、意大利驻京记

者参与了这一活动。方励之评价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2月份，国外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所谓的“政治犯”。不久另外42名在近年颇有影响的学者，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政治犯”。

这时，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刚36天就来中国访问。在布什访华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未经中方同意，单方面邀请方励之出席布什总统的答谢宴会，虽然方励之未能赴宴，但是美国对中国国内“不同政见者”的支持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合众国际社认为，布什邀请方励之出席宴会，是向中国发出有关人权的信号。这意味着即将到来的风波，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后来，《美国之音》所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驻华使馆为我国公安部门通缉的方励之夫妇提供“庇护”，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台湾方面也已插手。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后来国家安全部破获的几起台湾特务案证明，台湾在加紧对大陆的宣传攻势的同时，还指示派遣特务直接策划“学运”。

3月份，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的大小字报，明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在爱国主义

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在这期间，一些“民主沙龙”、“自由论坛”等各种集会纷纷出现，在北大的塞万提斯像前举办的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

这些情况表明，这场风波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

可以肯定的是，广大学生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参加后来的游行示威等活动的。但是由于一些人将其政治目的掩盖在“民主”、“自由”等激进的口号下，同时，学生和群众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和政治背景，这就造成了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操纵和利用的悲剧，迷茫的学生们走上了一条危险的征途。

幕后序曲已愈演愈烈，“大动作”呼之欲出！

但是，任何“大动作”都需有导火索，而且，这种导火索必须不早不晚，最好是在五·四前夕找到。

一些人在焦虑地期待着，紧张地寻觅着……。

历史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公元 1989 年 4 月 15 日，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会铭记这个日子。

这天一早，北京的天气便一反常态，阴沉而闷热，上午竟下起雨来，在“春雨贵如油”的北京，这是十分罕见的。它伴随着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更令人产生“天人同哭”之感。

下午两点，一个沉重、悲壮的声音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共和国上空传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巨星陨落，拉开了一场学潮、动乱、暴乱的序幕。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交互作用下，很快形成冷锋、酿成雷电，预示着一场狂风大澜的到来。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从下午两点半起，那悲怆的哀乐，便通过录音机，在校园反复播放，撕扯着每一个学子的心。

芸芸学子不会忘记胡耀邦在中国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中创立的丰功伟绩。是他，于1975年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领导起草了科技战线的《汇报提纲》；是他，于1978年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打破现代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马当先；是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深受迫害的“臭老九”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成为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是他，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将一个伟大人格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下午三点半，北京大学三角地，这个举世瞩目的中国政治神经兴奋点，开始出现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诗歌、散文、哀乐，呼唤着一个不朽的灵魂，人流，怀萦着一个悲痛的话题。“青山埋铮骨，绿水蕴忠魂”；“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

晚饭时分，北大三角地的挽联，悼念文章骤然增加。校卫队一改往日懒散、松懈的作风，加强了对进校人员证件的

严格盘查。任何一个对北大稍有了解的人，任何一个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十分明白，那一直等待了好几个月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一场学潮即将由此掀起狂澜。

人们不会忘记，1986年底那场学潮平息后，在高等院校，曾刮起过一阵嬉皮士风暴。麻派(玩麻将)、托派(通过托福考试出国)、旋派(迷恋于舞场)风靡校园，一种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的情绪在“天之骄子”中恶性蔓延。

结果，商品广告充斥校园，舞场门前热闹非凡，小金额赌博通宵达旦；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出现了这样的“格言”：“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托福能够救自己”；“耗子也会逃离快沉的船”。

1987年，各院校异乎寻常地显得平静。

1988年4月初，与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一大批知名人士的呐喊遥相呼应，北京大学贴出了由部分研究生、青年教师起草的致两会公开信，一批大字报纷纷响应，教育经费短缺成为众矢之的，一场学潮一触即发。

事隔两月，1988年6月初，地球物理系一名代培研究生柴庆丰被恶徒殴打致死，北大校园再起波澜。当晚，上千名学生游行到公安部，要求严惩凶手。在燕园，不但为死者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悼念活动，而且再次提出了知识分子待遇低下，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等关联性问题。三角地的演讲活动曾通宵达旦。一些学生积愤于“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严酷现实，纷纷拿起鞋油鞋刷，胸戴北京大学校徽，走上长安街头，步入天安门广场，为过往游人擦拭皮鞋，从而掀起了热闹一时的擦皮鞋风波。为了有组织地进行游行示威，学生中还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后因有关部门积极疏导，加之杀害柴庆丰的凶手很快受到法律的严惩，结果在1988年6

月8日上午，也就是一场大规模静坐示威即将爆发前夕，行动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群龙无首，学潮随之流产。

两次学潮，引而未发，或者说发而未引起普遍反响。但这次学潮的来势就大不相同。陈希同市长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引用香港《明报》的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往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无私无愧”。这是胡耀邦猝然病逝后立即引起民众大规模自发悼念活动的关键所在。作为继“人民的总理”之后第二位身后获此殊荣的共和国领导人，他的60年政治生涯及其历史功绩，实际上已得到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高度评价。人们对他的逝世表示由衷的悼念之情，也并不奇怪。

可就在4月15日晚，北京三角地，出现了一些与悼念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大字报。一张署名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字报，上书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北大人，你们太叫我们失望了”。另一张题为《赞耀邦——并致另一些人》的大字报，则明目张胆用下流语言攻击党中央当初批评胡耀邦是“骂别人淫荡只因为自己阳痿”。哀调的弦外之音，如鼓如瑟。

人们的目光再次集中在北大。

4月16日，星期天，共和国迎来了第四个夏时制的起始日。仿佛时间老人也按捺不住地要提前发作。大清早，北大、人大和北师大的部分学生便来到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放了几个花圈。一位人民大

学的研究生侃侃而谈：“我们悼念耀邦，是因为他堪称民族英烈、民主斗士，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挚友”。“虽然今天花圈不多，但是我可以肯定，事态的发展必将出现1976年清明节那样的盛况”。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不啻一场历史的旧片重演。但是感情与理智的偏差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有人出来撩拨这场业已灼人的大火。

16日这天，除北京大学外，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也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挽联和悼念文章，仅仅一日之隔，校园景观大变。在人民大学，甚至出现了长达数十米的巨大挽联，观者如云。一位家住人民大学二炮家属区的妇女见状紧张不已，“学生又要闹事了吗？”她问一位路人。

“不，学生是在悼念耀邦”。路人告诉她。

“但是悼念活动用得着这样大张旗鼓吗？”妇女疑惑不解。

“……”，路人语塞，感到不知该从何讲起。

悼念文章、诗歌、挽联仍如潮水涌来。

4月17日，一些学生从天安门广场带回消息：16日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花圈于一夜之间被席卷一空。振荡受到反弹，接着便是更有力的下一次撞击。在阵阵哀乐声中，立刻有几位北大学生发起悼念胡耀邦的筹备活动。他们买来黑纱，扎起花圈，2000多名北大学生抬着花圈步行到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并以守护花圈的名义静坐。

尽管北大研究生会和学生会成立了悼念胡耀邦同志委员会，在校内设置灵堂，组织悼念活动，但是，学生的注意力已从校内转向校外，从单纯的悼念活动转向要求正确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了。

在北大三角区，逐渐出现了一些并非单纯寄托哀思的挽联，如“英雄胡不长寿，后辈谁来耀邦？”，横额是“国殇”；“真诚的人死了，虚伪的人却活了下来，热情的人死了，冷漠来将他埋葬”；“胡耀邦的逝世是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事业的巨大损失”；“小平大意失耀邦”。其中隐意是不言自明的。

追悼总是要缅怀过去的，缅怀过去便自然涉及到对死者的评价。

据说，1989年3月“两会”之后，被新闻记者以“有钱难买老来瘦”、“一字千金”轻松地曝了曝光的胡耀邦，回到家中曾和家人谈到“希望党中央对1987年的事给我做个结论，当然，如果不做我也不勉强”。还写成了纸条，由长子胡德平交给了中央。

青年学生要求全面地公正地评价胡耀邦，还有一个心理背景。用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学生的话来说，“耀邦同志是因为学潮而辞去总书记职务的，现在，我们就是要通过学潮为他平反”。

学生中传闻，虽然导致胡耀邦1987年初辞去总书记职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导火线和催化剂，还是1986年秋末爆发并波及全国的大学生风潮。

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即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致力于平反“文化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随后，胡耀邦就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一度称为党的主席。

在任中央总书记的五、六年里，胡耀邦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但是，作为主要职责是抓政治思想的总书记，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视不力。

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讲话，